

文史哲丛刊 / 第二辑

主编 王学典

步履维艰

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刘丽丽 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文史哲丛刊（第二辑）

主编 王学典

步履维艰：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刘丽丽 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步履维艰：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 刘丽丽编.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文史哲丛刊. 第二辑)
ISBN 978-7-100-16287-6

I. ①步… II. ①刘… III. ①近代化—研究—中国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0532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文史哲丛刊
(第二辑)

步履维艰：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刘丽丽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287-6

2019年3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2

定价：56.00元

出版说明

《文史哲》杂志创办于1951年5月，起初是同人杂志，自办发行，山东大学文史两系的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先生构成了最初的编辑班底，1953年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之一，迄今已走过六十年的历史行程。

由于一直走专家办刊、学术立刊之路，《文史哲》杂志甫一创刊便名重士林，驰誉中外，在数代读书人心中享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她所刊布的一篇又一篇集功力与见识于一体的精湛力作，不断推动着当代学术的演化。新中国学术范型的几次更替，文化界若干波澜与事件的发生，一系列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提出与讨论，都与这份杂志密切相关。《文史哲》杂志向有与著名出版机构合作，将文章按专题结集成册的历史与传统：早在1957年，就曾与中华书局合作，以“文史哲丛刊”为名，推出过《中国古代文学论丛》、《语言论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司马迁与史记》等；后又与齐鲁书社合作，推出过《治学之道》等。今者编辑部再度与商务印书馆携手，推出新一系列的《文史哲丛刊》，所收诸文，多为学术史上不可遗忘之作，望学界垂爱。

文史哲编辑部

商务印书馆

2009年10月

《文史哲丛刊》第二辑
编辑工作委员会

顾 问 孔 繁 刘光裕 丁冠之

韩凌轩 蔡德贵 陈 炎

主 编 王学典

副主编 周广璞 刘京希 李扬眉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建 王学典 王绍樱 刘 培

刘丽丽 刘京希 孙 齐 李 梅

李扬眉 邹晓东 陈绍燕 范学辉

周广璞 孟巍隆 贺立华 曹 峰

目 录

- 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及其特点..... 胡 滨 / 1
- 鸦片战争与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李德征 / 16
- 洋务运动与国内市场..... 吴承明 / 31
-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 兼论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胡 滨 / 40
- 中外学者对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几点看法..... 李德征 / 55
- 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笔谈）..... 73
- 戊戌维新三题议..... 何中华 / 73
- 略谈戊戌变法的“保守”与“激进”..... 马洪林 / 79
- 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颜炳罡 / 83
- 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向..... 翁美琪 / 86

2 步履维艰：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 | |
|-------------------------|-----------|
| 维新悲剧与儒学情结 | 吕明灼 / 89 |
| 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的文化冲突 | 高旭东 / 93 |
| 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 仪平策 / 96 |
| 戊戌变法是一个多重系列的历史发展 | 胡 成 / 98 |
| 戊戌维新与新闻出版 | 雷 颐 / 101 |
| 戊戌维新与中国文化近代化（笔谈）..... | 104 |
| 戊戌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 郭廷礼 / 104 |
| 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 陈永标 / 107 |
| 维新变法运动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化 | 颜廷亮 / 109 |
| 戊戌维新与黄遵宪诗风新变 | 曹 旭 / 112 |
| 戊戌变法的思想基础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 马卫中 / 115 |

晚清政府贫困化与中国

| | |
|---------------------------|-------------------|
| 早期现代化的受挫 | 唐贤兴 卢向国 牛纪伟 / 119 |
| 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 吴承明 / 138 |
| 论清末农业政策的近代化趋向 | 赵泉民 / 150 |
| 晚清自开商埠的分布特点及作用 | 张 践 / 169 |
| 德占胶澳对近代中国的双重影响 | 吕明灼 / 180 |
| 论租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影响 | 吴士英 / 186 |
|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 郭海燕 / 199 |

从严复到胡适：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

| | |
|-------------|---------------|
| 传承与调适 | 赵慧峰 俞祖华 / 218 |
|-------------|---------------|

| | |
|---------------------------|---------------|
| 孙中山民主主义的历史特点..... | 吕明灼 / 241 |
| 谈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 | 龚书铎 / 259 |
| 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 |
| ——兼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 | 郭延礼 / 268 |
| 近代商人与教育变革..... | 闫广芬 田正平 / 316 |
| 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思潮的再认识..... | 丁守和 / 342 |
|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 | |
| ——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 王树人 / 360 |
| 后 记..... | / 372 |

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及其特点

胡 滨

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是极为错综复杂的，有侵略、被侵略的关系，经济贸易的关系，文化交往的关系，等等。本文仅试图从一个侧面，探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阶段性及其特点。

一、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欧洲于14世纪发生了文艺复兴，它以理性、人文主义和科学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后二三百年间，欧洲又相继发生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重大事件，最后资产阶级于17、18世纪夺取了政权，接着进行“产业革命”，工业生产突飞猛进，社会发展十分迅速。当时的中国却仍然停滞在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状态，对外部世界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茫无所知，在经济、政治、

文化等方面均已落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

落后必然挨打。1840年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正如马克思所说：“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①从此，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由封闭的封建社会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对外开放，既是坏事，又是好事。因为被迫开放意味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的主权遭到践踏，中国人民遭受奴役和欺凌，所以它当然是一件坏事。但另一方面，它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迫使中国人睁开眼睛观察和了解世界，使近代中国好几代人为挽救民族危亡和谋求祖国独立富强而进行新的艰苦探索，保守的、沉闷的、落后的中国出现了生机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被迫对外开放在客观上又变成了一件好事。

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伴随着殖民主义者的军舰、大炮、鸦片和商品来到中国，在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文化面前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对它的最初反响如何呢？

广大人民群众在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出于民族的义愤，不容易把一种先进的文化同野蛮的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区分开来，因而一下子很难认识和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长处。大多数封建士大夫背着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的沉重包袱，怀着强烈的“夷夏之辨”的心理，不愿意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采取了憎恶和鄙视的态度。他们是后来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顽固派的前身。当时只有极少数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识之士能够摆脱各种偏见，正视现实，逐渐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某些长处，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便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表现出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成为近代中国一切爱国或进步人士为挽救祖国危亡而寻求真理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 4 个人，作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他们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水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和不同的程度上面向世界，向西方国家学习，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文化，用来作为起衰振弱、改造中国的工具。

洪秀全是农民阶级的杰出领袖。他出生在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的广州附近的花县，所以有条件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的基督教。他接受了基督教中的某些原始教义和宗教仪式，用来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于 19 世纪 50 年代初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利用基督教作为发动工具的农民起义，反映了近代中国刚刚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时代特征。基督教绝不是反封建的锐利武器，加上农民阶级本身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绵延了 10 余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终于失败了。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者、近代中国著名的改革家。他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紧要关头，出面倡导变法救亡。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1358 页。

4 步履维艰：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他采用开学堂、设学会、办报纸等西方国家的新式宣传手段，传播他的维新变法思想。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落后，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和制度方面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反对进行枝枝节节的改革，号召实行“大变”、“全变”，即改变中国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英日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他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起，引进西方的进化论、民权、平等学说，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作为封建主义文化核心的纲常名教，于1898年把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既是一个爱国民主运动，又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这是被人们久已公认的。

严复是近代中国一位最出色的启蒙思想家。他早年留学英国，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着较深刻的理解，返国后一面执笔撰写政论性文章，一面着手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名著，名噪一时，影响极大。他的译著主要有：1. 赫胥黎《天演论》，1898年4月出版；2. 亚当·斯密《原富》，1901—1902年出版；3. 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年出版；4. 斯宾塞《群学肄言》，1903年出版；5. 甄克思《社会通论》，1904年出版；6. 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年出版；7. 穆勒《名学》（前半部），1905年出版；8. 耶芳斯《名学浅说》，1909年出版。通过这些译著，严复较系统地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这八大译著所包含的理论，构成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对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迪作用。当时国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通过严复的译著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的。

孙中山是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在年轻的时候便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后来又周游世界，考察西方国家的风土人

情，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从19世纪末起，他便决心推翻清王朝，建立“合众政府”，开始从事武装起义活动。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联合当时旅日的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建立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不久他把这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孙中山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企图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美法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不仅运用批判的武器，对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口诛笔伐，而且对清王朝进行武器的批判，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值得注意的是，他既羡慕西方国家的民主和自由，又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和劳资的对立，认为中国革命不应停留在“媿迹于欧美”上，而应“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①。这当然只能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空想。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军阀们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民国名存实亡，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政治上复辟风甚嚣尘上，到处呈现一片乌烟瘴气的景象，很多知识分子茫然不知所措，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1915年，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批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

传统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改造国民性”等主张。他们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核心实质，要求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到中国来，认为只有德、赛两先生才能医治中国封建主义的痼疾。他们对封建传统文化批判程度之激烈，范围之广泛，内容之深刻，超过了以往的历次批判运动，是近代中国最彻底的一次思想启蒙，从而把戊戌维新运动以来的思想解放潮流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水平。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但它不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而是无产阶级文化，是人类最先进文化的结晶。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拯救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向西方国家探求富强之道，直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了。”^①

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中，封建地主阶级的动向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封建地主阶级分裂为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唯经是尊，唯古是尚，死守“夷夏之大防”，把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反对学习一切新事物，幻想开历史的倒车，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甚至主张“用夏变夷”。倭仁于1867年在有关同文馆招收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学的争论中所说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9页。

不在技艺”等言论^①，可以代表这一派人的中心思想。洋务派是封建地主阶级中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集团，可以称之为地主阶级开明派。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西方军火武器的优越性，于是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始，逐步扩展到建立工矿、交通、电讯等民用企业，从而使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他们仅承认中国在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落后于西方，认为中国的封建典章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远远超出于西方国家之上。李鸿章于1865年筹办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时曾上折奏称：“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獐豸之俗，所以致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访求又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视，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尤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② 这些言论，基本上反映了洋务派早期的共同看法。从这种认识出发，洋务派把学习西方的范围仅限于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即表层文化），并企图用这些东西来捍卫中国的封建统治。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这一步迈得不大、不快、不好。他们倡导的洋务运动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初，终止于90年代中期，持续了30多年，收效甚微，人们有种种理由批评它、指责它，但它毕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至于20世纪初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所施行的新政，其中包括预备立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故宫博物院1929年影印本，第24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第35页。

宪的措施在内，虽然也具有向西方学习的意义，但那是清王朝在革命形势压力下被迫做出的某些让步，是被动地、消极地而不是主动地、积极地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以客观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十分有限，与洋务运动时期的情况显然不可相提并论。辛亥革命前 10 年间，在历史舞台上起主要作用的不再是封建地主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各派系（主要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 19 世纪 90 年代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时候起，学习西方和促使中国近代化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资产阶级的肩上，封建地主阶级已成为被批判、被打倒的对象。

二、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三个阶段

纵观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大致上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至 90 年代中期为止，主要学习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以及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表现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太平天国后期重要领袖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所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方案，在农民起义队伍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付诸实现，反而被洋务派官僚逐步实现了，这反映出向西方学习在当时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中国社会没有出现新的阶级以前，洋务派官僚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肩负起向西方学习、促使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在这个阶段，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这是符合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的，表明向西方学习刚刚开始，中国的近代化刚刚起步，反映出近代中西文化开始接触时期的特点。

第二阶段，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20世纪头10余年为止，主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理论与制度，表现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在这个阶段，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透过表层文明，觉察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不仅仅在于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而且在于它们拥有先进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他们引进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思想武器，批判“君权神授”与三纲五常等陈腐的封建教条，并先后着手进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和民主共和制度的尝试。虽然他们所做的尝试都失败了，但却大大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第三阶段，自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主要学习西方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表现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这说明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核心实质。他们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作为思想武器，对几千年来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开火，使人们开始从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思想上获得一次大解放。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虽然仍根深蒂固地继续存在，但却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扫荡，开始发生了动摇。新文化运动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铺平了道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非自近代开始。早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曾经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神学的同时，译介了若干有关天文、数学、物理、地理及哲学方面的书籍。当时输入的这些西学，